论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老年书写

武艳辉，任　冰

（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以宏大的悲剧叙事，刻画了李尔、葛罗斯特两位老年形象的多重困境与精神突围，成为文学老年学的经典范本。本文试图从老年角色的生存困境、伦理冲突的二元对立以及精神觉醒三个维度，剖析老年群体权力丧失、代际背叛、身体衰退下的边缘化本质，揭示青年与老年二元对立的文化根源，以及突破叙事闭锁、实现自我救赎的可能路径。鉴于此，本文旨在解构《李尔王》中根深蒂固的衰老文化偏见，彰显悲剧背后莎士比亚对老年主体价值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莎士比亚；《李尔王》；老年书写；人文关怀

收稿日期：2026 年 10 月 12 日　　**中图分类号：**I106.3

通讯作者：任冰　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Representations of Old Age in Shakespeare´s King Lear

Wu Yanhui, Ren B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China）

Abstract:With its grand tragic narrative, Shakespeare’s King Lear depicts the multiple predicaments and spiritual breakthroughs of two elderly figures, including Lear and Gloucester, establishing itself as a classic model in literary gerontolo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essence of marginalization experienced by the elderly amid loss of power, intergenerational betrayal, and physical decline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living predicaments of elderly characters,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ethical conflicts, and spiritual awakening. It aims to reveal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youth and old age and the possible paths to break through narrative closure and achieve self-redemption.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aims to deconstruct the deep-rooted cultural prejudices against aging in King Lear and show the humanistic care for the subjective value of the elderly embedded in the tragedy.

Key words: Shakespeare; King Lear; Representations of old age; Humanistic concern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是英国乃至全世界最具代表性、最杰出的剧作家和诗人之一。莎士比亚出生于英格兰斯特拉特福镇（Stratford-upon-Avon），于 1616 年 4 月 23 日去世，葬于斯特拉特福的三一教堂。他一生共完成了 37 部戏剧，包括喜剧、悲剧、历史剧和悲喜剧，以及 154 首十四行诗、2 首长篇叙事诗和其他诗作。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其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之一。但社会对年龄的价值判断与老年关怀并没有随之同步深化，反而固化了青年与老年的二元对立：年轻被赋予价值与活力，老年则与衰老、疾病、无用和死亡等联系到一起。这种二元对立引发的年龄歧视背后实则是西方的衰老文化。正如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断言：老年“不仅是生物学事实，也是文化事实”，这一批判揭示了西方根深蒂固的衰老文化叙事[1]。玛格丽特·M. 古莱特进一步指出，“年龄和衰老正逐渐成为被文化所

塑造的年龄状态”，这一观点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得到具体呈现[2]。在《李尔王》中，李尔因年迈而退位，却遭到女儿们的背叛与抛弃；作为老年伯爵的葛罗斯特，同样承受着被亲生儿子陷害、双眼被挖去的痛苦。两位老人的命运共同揭示了西方文化规约下老年人的生存困境。文学老年学的兴起为解读经典文本提供了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据此，本文以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为分析对象，以文学老年学的核心理论为视域，探讨老年困境的文化根源与精神突破的可能性，为理解莎士比亚经典悲剧的人文内涵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一、生存困境：边缘化与客体化

在《李尔王》中，老年人的生存困境并非只源于身体的衰老，更源于西方文化中长期建构的衰老叙事与衰老文化。追溯西方社会关于老年的观念，西蒙·德·波伏娃认为，“自经验的概念遭到贬抑以来，老年人的地位便显著下降”[1]210。这种文化观念在剧中转化为对李尔和葛罗斯特的直接伤害，使他们陷入边缘化与客体化。

李尔的生存危机始于他对老年的误判以及主动交权。他公开宣称：“我已经把我的国土划成三部；我因为自己年纪老了，决心摆脱一切世务的牵萦，把责任交卸给年青力壮之人，让自己松一松肩，好安安心心地等死”[3]。这一选择本质上是对文化建构的“老年人无用”标签的被动接受；他认为老年意味着丧失权力、依赖他人，却未能认识到这一文化预设背后的风险。因此，当李尔王失去权力之后，高纳里尔公然辱骂他为“无用的老头”，并讥讽道：“这老废物已经放弃了他的权力，还想管这个管那个！凭着我的生命发誓，年老的傻瓜正像小孩子一样，一味的姑息会纵容坏了他的脾气”[3]。里根以他年迈体衰为由，强迫他削减侍从，声称：“啊，父亲！您年纪老了，应该让一个比您自己更明白您的地位的人管教管教您；所以我劝您还是回到姊姊的地方去，对她赔一个不是”[3]。在老年文化偏见的逻辑中，李尔的年老成了一种原罪，为剥夺与欺凌提供了正当理由；与此同时，他的需求与尊严被完全漠视，最终被驱逐到荒原之上。在那里，他在暴风雨中呼喊：“神啊，你们看见我在这儿，一个可怜的老头子，被忧伤和老迈磨折得好苦！”，最终沦为“一个可怜的，衰弱的，无力的，遭人贱视的老头子”[3]。

葛罗斯特的苦难则凸显了老年客体化与身体暴力的交织。作为一位老人，他对爱德蒙的盲目信任不仅使他失去了长子对他的信任，还导致康华尔挖去了他的双眼。失明之后，他悲叹道：“天神掌握着我们的命运，正像顽童捉到飞虫一样，为了戏弄的缘故而把我们杀害”[3]120。他们的身体成为他人权力争斗的工具，个人价值被彻底否定。这种客体化并非异常现象。正如凯瑟琳·伍德沃德所指出的，西方社会怀有一种“如此贬低老年的文化”[4]。在这样的衰老文化中，老年人被贬抑为客体，他们的经验与情感被忽视，甚至成为他人利益的牺牲品。

《李尔王》对老年人生存困境的刻画，揭露了西方文化建构的虚伪性：李尔主动交出权力，本是对老年人应安逸享乐这一文化期待的履行，最终却只换来背叛；葛罗斯特因与老年相联系的轻信而付出双眼的代价。这表明文化对老年人的关怀实质上是剥夺权力的借口。当老年人失去权力与效用，便会被主流社会无情抛弃。暴风雨意象承载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自然的残酷，更是年龄歧视文化的物质化呈现。李尔在暴风雨中的挣扎，正是老年人在文化压迫下为生存而抗争的缩影。

二、伦理冲突：青年与老年的二元对立

西方文化中长期建构的青年与老年的二元对立，在《李尔王》中转化为激烈的代际伦理冲突。凯瑟琳·伍德沃德明确指出，西方文化“将一切正面价值集于年轻”，而将老年与疾病、无用和死亡相联系。这种二元对立成为剧中代际背叛的文化根源[4]。

《李尔王》中伦理冲突的核心，在于文化对老年人价值的否定所引发的孝道崩塌。高纳里尔与里根对李尔的不孝，并非仅仅是个人的恶行，而是文化偏见的内化。她们将李尔的年老视为负担，将他的需求视为无理要求，实质上是在为“老年人无用”的文化叙事背书。里根剥夺了李尔的侍从与话语权，声称：“父亲，您该明白您是一个衰弱的老人，一切只好将就点儿”[3]。这一行为背后，是赋予青年的文化优越感以及对老年无用的解读。与此同时，弄人以免带调侃的口吻讥讽李尔：“你

应该懂得些世故再老呀”[3]。这种看似玩笑的戏谑，实则强化了“老年人缺乏智慧”的文化刻板印象，进一步摧毁了代际伦理的纽带。

与女儿们的不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考狄利娅、肯特与爱德加坚定不移的忠诚。考狄利娅谴责她的姐姐们：“假如你不是她们的父亲，这满头的白雪也该引起她们的怜悯”[3]。她的忠诚本质上是对二元对立文化的抵抗，因为她承认老年的价值、珍视代际伦理纽带，而非将老年视为负担。肯特乔装改扮追随李尔，忍受足枷之辱；爱德加假扮疯丐照顾失明的葛罗斯特。这些行为打破了“老年人被忽视”的文化预设，彰显了代际伦理。

苏珊·桑塔格关于疾病作为隐喻的理论，为解读这一伦理冲突提供了另一视角。桑塔格认为，“最令人恐惧的疾病，是那些不仅被视为危及生命、而且被视为使人丧失人性的疾病”[5]。在《李尔王》中，老年被文化建构为一种潜在的疾病。李尔的衰老被女儿们视为痴呆与无用的象征，进而成为她们背叛的借口。这种对老年的隐喻建构，彻底扭曲了代际伦理。《李尔王》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拒绝将老年困境简单归因于身体衰退的浅薄误解，而是揭示了文化规约下老年人所遭受的无形压迫。李尔因接受“老年人无用”的文化标签而主动交权，最终沦为被放逐的可怜老人；葛罗斯特则因与老年相联系的刻板轻信而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被挖去双眼后沦为客体化的存在。他们的苦难印证了西蒙·德·波伏娃的核心论断：老年是一种文化事实——老年人的边缘化与客体化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中长期建构的衰老叙事的产物，而非生命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文化建构通过将老年与无用、衰弱和死亡相联系，制造了青年与老年的二元对立，从而扭曲了代际伦理。因此，高纳里尔与里根的背叛并非仅仅是个人的恶行，而是内化的文化偏见的必然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李尔的悲剧中也含有自我建构的成分，他最初对女儿们的考验，本质上是借国王的权力寻求情感确认，而非建立代际平等的关系。这种对权力的执迷，使他在失去权威后无法接受老年的脆弱身份，进一步加剧了伦理冲突。而考狄利娅的悲剧则在于，她试图以忠诚修复破裂的伦理，却以生命为代价。这恰恰凸显了西方青年与老年二元对立文化的冲突。

三、精神觉醒：突破叙事闭锁

《李尔王》的悲剧不仅描绘了老年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李尔与葛罗斯特的精神觉醒，探索了老年人突破马克·弗里曼所称“叙事闭锁”——即“过早地断定自己的人生故事已经结束”[6]——的可能性。这种觉醒不是外在的救赎，而是历经苦难后通过自我反思对老年主体价值的重建。

李尔的精神觉醒经历了一个从盲目到悔悟的完整过程。起初，他沉溺于权力与虚荣，因考狄利娅的诚实而将她放逐——这实质上是在为“老年人渴求奉承”的文化刻板印象背书。在遭到女儿们背叛后，他在暴风雨中逐渐反思，承认：“请不要取笑我；我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傻老头子，年纪活了八十多岁了；不瞒您说，我怕我的头脑有点儿不大健全”[3]。这种自我批评标志着他从文化偏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临终之际，他抱着考狄利娅的尸体悔恨地哀叹：“从前我一举起我的宝刀，就可以叫他们吓得抱头鼠窜；现在年纪老啦，受到这许多磨难，一天比一天不中用啦”[3]。此时，他不再执着于国王的身份或青年的强健，而是接受了老年的脆弱，认识到生命的本质在于情感与真诚。这一觉醒打破了弗里曼所描述的无力型叙事闭锁：“叙事者相信故事的结局早已注定，未来除了死亡别无期待”[7]。李尔的人生故事在临终之际达到的是高潮，而非终结，因为他突破了西方根深蒂固的衰老叙事，走向了另类的可能路径。

葛罗斯特的精神觉醒表现为对命运的接受与与自我的和解。失明之后，他猛然醒悟，忏悔自己诬陷爱德加的罪过。他打破了根深蒂固的老年叙事闭锁，即一种“叙事者相信过去的美好已不可追回，或过去的悔恨对当下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否认人生故事的连续性”的状态[7]。他也不再执着于过往的权力与荣耀，而是选择以隐忍承受苦难，最终在爱德加的陪伴下实现了精神上的和解。弗里曼强调，“叙事闭锁不应仅从个体层面来界定；它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源于人们被周围的形象与话语无意识地贬为活死人”[6]。在《李尔王》中，李尔与葛罗斯特的觉醒本质上是对衰老文化叙事的反抗。他们拒绝被“老年人无用”的标签所定义，并通过自我

反思重建生命的意义。

莎士比亚并未止步于描绘老年的苦难，而是通过两位老人的精神觉醒指明了突破叙事闭锁的路径。李尔在暴风雨中的自我反思与最终的悔悟，加之葛罗斯特失明后对命运的接受与与自我的和解，证明老年并非生命的终点，而是自我认知的升华期。他们的觉醒没有否定老年的脆弱，也未屈从于“老年必须坚韧”的极端叙事；而是通过真诚的自我反思，打破了马克·弗里曼所称的叙事闭锁，重建了老年的主体价值。老年主体价值不在于权力的保留或身体的强健，而在于情感的真诚与生命的完整。

考狄利娅、肯特与爱德加坚定不移的忠诚，进一步印证了伦理温暖在消解文化偏见方面的变革力量，凸显了代际平等与包容的重要意义。李尔在暴风雨中的经历与葛罗斯特失明的痛苦，成为他们反思自我、突破文化偏见的催化剂。这种苦难即觉醒的叙事赋予老年以独特的存在：老年不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自我认知的高潮。更重要的是，李尔与葛罗斯特的觉醒并未否定老年的脆弱，而是选择积极拥抱老年主体并直面老年主体困境。这与“老年必须坚韧”或“老年等于衰弱”这两种极端文化建构叙事形成鲜明对照，彰显了莎士比亚的人文智慧：老年的价值不在于是否保持年轻，而在于是否活出真实的自我。

四、结语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对老年的深刻书写，不仅建构了令人震撼的悲剧叙事，更通过文学之镜揭示了老年经验固有的文化建构性，为文学老年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典范本。该剧通过李尔与葛罗斯特两位老年形象的命运，对衰老的真相进行了三重追问：生存困境的文化根源、伦理冲突的二元性质，以及精神觉醒的路径，最终指向对老年主体价值的再确认与人文关怀的深刻彰显。在全球化老龄人口日益增长的当代社会，《李尔王》中的老年书写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相关性。它提醒我们，针对老年的文化偏见并非固有的真理，而是可被解构的叙事建构，可以通过自我反思与社会包容来实现。老年人不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承载生命智慧与经验的象征存在，其价值不应由年龄、权力或身体状况相关的标签来界定。剧中所倡导的叙事赋权理念，为应对现代社会的老龄化挑战提供了重要启示：只有打破“老年人无用”的文化神话，赋予老年人表达自我、重建生命意义的空间，每一个人才能在晚年获得尊严与价值。

参考文献：

[1] B. S. de. The Coming of Age. Translated by Patrick O’Brian, Putnam, 1972.

[2] G. M. Morganroth. Aged by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3] 莎士比亚 . 李尔王 . 朱生豪，译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4] W. Kathleen. Ageing and Its Discontents: Freud and Other Fic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5] S. Susan. The Double Standard of Aging. England: Routledge, 2003.

[6] F. Mark. When the Story’s Over: Narrative Foreclosur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elf-renewal [A]. In M. Andrews (eds.). Lines of Narrative [C]. London: Routledge, 2000: 81-91.

[7] 王薇 . 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父亲的眼泪》中的老年叙事 [J]. 当代外国文学 , 2025, (4):53-60.

作者简介：武艳辉（2003- ），男，汉族，山西太原人，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5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文学、全球南方。任冰（1981- ），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英美文学。